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再回顾*

——访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马克·布鲁姆教授

孟 飞

马克·布鲁姆 (Mark E. Blum), 1937 年生, 美国著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 路易斯维尔大学教授。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 马克·布鲁姆先后在美国、瑞士和奥地利进行学习和科学研究工作。1970 年, 他凭借研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 1976 年起在路易斯维尔大学欧洲历史系任教至今。马克·布鲁姆是美国乃至全世界较早关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 近几十年来出版了多部与之相关的理论作品, 其中主要包括《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 1890-1918: 一个精神传记的研究》(1985 年)、《西方历史思维的基本逻辑》(2006 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第 1 卷 2015 年, 第 2 卷 2017 年)。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指称以奥托·鲍威尔、麦克斯·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卡尔·伦纳、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等为代表的奥地利社会主义倾向。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对思想史、学术史和政治史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的马克·布鲁姆教授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常年的跟踪研究使其跻身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和文化史领域的专家行列。不过, 国内学界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个第二国际内部的智识和实践团体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由此,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孟飞通过对马克·布鲁姆教授的访谈, 整理出布鲁姆教授关于他的学术生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等问题的一些独到见解,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 (采访者简称▲, 下同): 布鲁姆教授, 您好, 感谢您接受我的专访。您和斯马尔多内教授编著的两卷本《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全球出版, 您能否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出版计划的初衷, 您想通过引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成果给学界带来什么新的启发?

● (被采访者简称●, 下同): 我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它的确很重要。我们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著作和文章的翻译和推介分为两卷, 第一卷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衍生策略, 第二卷更多地集中在转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战术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坚信,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思想中产生的。这种思想使新的社会科学探究理念和方法生长出长期的社会化战略。正如奥托·鲍威尔在 1913 年针对党内人士的复辩中所指出的那样, 他们认为需要采取即时策略, 却忽略了社会生产活动的长期趋势及其相应的政治—经济结构。奥托·鲍威尔强调, “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15CKS0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9 批面上资助项目(2016M591751)的阶段性成果。

研究政治问题时，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是我们最大的骄傲，这使我们凌驾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论调之上。鲁道夫·希法亭将重点放在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政治代理人的理论所产生的战略上。对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接受，包括对社会主义必要性的认可，不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因为承认必要性是一回事，而为必要性工作是另外一回事。为必要性工作需要战术决策，然而具有马克思主义战略眼光的战术始终是重点。因此，卡尔·伦纳、奥托·鲍威尔、麦克斯·阿德勒、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以及鲁道夫·希法亭的社会主义策略研究自始至终贯穿于这两卷本的文集中。

当然，我们也需要关照这些异质性的战术、战略的有效性和持久性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些著作和文章，带领读者观察从20世纪初这些思想家的出现到1934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团体历史性失败的全过程，尽可能全面展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轮廓。

▲：是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衰败（1889—1934）的历史过程值得反思，它在短时间内喷薄而出的智力火焰和实践爆发力给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带来强烈的震颤。但从第二国际形式上的失败到20世纪60年代，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相当匮乏的。欧美国家学者的研究过于零散，无法反映该学派的概貌特征。是什么吸引您开始了数十年全面、系统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整体研究？

●：我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相会是某种“偶然”。大约1952—1955年，我还相当年轻，那时我被弗洛伊德的理论俘获。弗洛伊德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维也纳的环城路，公寓的具体地址在第9巷。这个公寓先前的拥有者是维克多·阿德勒一家，包括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时常提及维克多·阿德勒和他的儿子，这时，我了解到维克多·阿德勒在1889年创建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我对弗洛伊德主义的热情始终延续，于是关注了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荣格个性化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完成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的本科学习后，我甚至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1959—1960）到瑞士苏黎世的荣格研究所进行专门的临床精神分析工作。不过我决定回国，因为1961年，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攻读英国历史硕士学位的资格，硕士论文的主题指向英国两位意见相左的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和威廉·格莱斯顿。格莱斯顿站在辉格党的基本立场上，大力褒扬对英国商业贸易产生促进作用的新兴资产阶级。迪斯雷利作为保守党人，则对工人团体报以同情，特别是农民。他早在1845年就出版了小说《女巫，或两个国家》，意指英国的阶级分化导致了社会底层和上层生活图景的巨大差异；同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问世。此时，我对“阶级”这个现实中存在的概念有了深刻反思，也开始直面自己政治—社会价值观生成的问题。1962年，我回归到荣格主义，着手撰写博士论文，不过荣格关于个体的个性差异构造倒成了次要问题，我更愿意探讨的是这种差异特征是如何在社会—家庭背景中建构的。我用了四年时间完成这篇论文，借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基础，我图绘了类似于传记式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群像。当然，其核心内容是考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精神塑型的过程——他们如何在资产阶级家庭背景和布尔乔亚文化规范中脱胎出社会主义精神气质，并最终联结成为具有共同体情感的团体。另外，萨特的小说《密室》给予了我重要的思考源点。在何种意义上表征了成功，又在何种程度上注定了失败？这是《密室》的主题，也是我整个学术规划的主题。因此，你会看到，如果我的博士论文强调的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失败，那么晚近的著作就是对他们成功经验的解读。

在写作博士论文之前，我内心就潜藏着一个对于更加团结的社会的期待，不论在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上存在多大的差异，人们都可以公平对待彼此，萨特、弗洛伊德、迪斯雷利等人是我形成这种坚固意识的思想地基。13岁时我开始读萨特，青年时代晚期弗洛伊德告诉我人在精神本质上的同构性，而迪斯雷利敦促我思考复杂社会的政治取向问题，这些都是我所在的美国社会广泛缺乏的。

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我遭遇了维克多·阿德勒，并第一次涉猎了马克思主义的专著。随着对奥托·鲍威尔、麦克斯·阿德勒、卡尔·伦纳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认识不断加深，我更加赞赏他们在复杂社会构造中寻求团结高效社会—政治组织的尝试。他们为之奋斗的高级社会形式恰恰也是美国文化中不去参考的另类范本。我以为，无阶级社会的实现是长期的事业，它需要在文化及教育方面对年轻一代进行再教育、再养成，尤其在美国这样个人主义盛行的地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想要依靠教育手段达成社会主义目标需要数代人的思想接力，因此，我必须反思自己的学术规划，虽然一场文化革命非常必要，但文化革命毋宁说是文化演化，在美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暴力压迫已无从解决任何一个社会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学生运动播散范围很广、势头强劲，打破旧思维、唤起新方法成为我同时代青年的共同口号。这也感召我到费城一家学院教书，在课堂上我更加积极地与学生互动，营造合作互利的学习氛围，并走下讲台与学生们坐在一起共同探讨社会时弊。此刻，我心里默认自己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后代，正在为一个更好的社会助力。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实例，它不仅与世界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汇聚合流，而且必然受到奥地利这个中欧小国特殊地理、历史、政治、文化渊源的浸染。因此，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是诸多因素的聚合。据我观察，奥地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暗流涌动，其中包括政治共同体的动荡、民族—国家认同的衰微、教权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抬头以及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等。您认为在这些政治—社会背景中，哪个主导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核和理论气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们把目光放到更宏大的历史视阈中，15世纪开始神圣罗马帝国就存活在维也纳，个人和群体天生被赋权，这使得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地利的公民可以自由选择社群和个人的价值取向。1789年，神圣罗马帝国是由314个公国的疆土拼接而成的多语言的德意志王国。奥地利的情况亦相当复杂。比如，东南部居住者大量是斯拉夫人，而到了1704年，西班牙人在这片土地上也生活了超过两个世纪。于是，一方面，多民族王国最基本的规范是异质性的宗教和种族应被无差别地对待，只有统治者善于平衡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才能获得善治。另一方面，在整个帝国疆域内，没有一个地区是直接由皇帝操控的，它们都有自己的立法和自治权。然而，虽然德意志的绝大多数公国都有独立自主的传统，但是却分化出截然不同的两条路径——皇室成员对德意志皇族威权的绝对效忠和资产阶级对中央集权的抵制（自治的强烈要求）。显然，在奥地利和其他一些被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地区，反抗和革命的热情是羸弱的。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奥地利人学会了与上级权威沟通，可以拿家庭作为类比，就像孩子屈从于家长一样。事实上，在奥地利，所谓“家族”的观念不仅仅是一种喻指，皇帝和大臣们其实也谨慎地维护着这种不均衡的对话关系。就像在一个家庭中，即使孩子调皮捣蛋，也从来没有被赶出家门。为哈布斯堡王朝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是维持自身权威的必要通路这样才不会丧失“相对公平”的权益分配。这种紧张关系一直维系到20世纪20年代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登场，伊格纳兹·赛佩尔的基督教社会党和右派政党和解，之后又与社会民主党开启了联合执政的局面。

可以说，上述“家族意识”标注了哈布斯堡王朝处理纷争的规范，即一种对话式的质询和政治—社会互动。维克多·阿德勒及其继承者在奥地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可能脱离这种标准、传统和语境。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原则，但革命斗争的原则总是口头的，却不付诸行动。比如，总罢工是工人运动最有力的手段之一，但是他们从没有真正发起过团结起来进行总罢工的动员，所以仅仅被称为“防御性暴力”。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刊《工人报》和《斗争》刊载的文章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妥协性的直接证明，他们强调合作、避免对抗。关键问题是，即使发生了阶级冲

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小心翼翼地保持不偏不倚的状态，力图最终达成某种周全的议案。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与列宁坚毅决绝的暴力革命理论相去甚远。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希冀将奥地利帝国的各个民族都平等地纳入党的内部，最终无疾而终，因为奥地利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尤其是捷克人），但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不会轻易丢弃开放与合作的态度。这里，我举一个突出的例子表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偏不倚”，奥托·鲍威尔公开地对阶级敌人伊格纳兹·赛佩尔的去世表示哀悼。可以说，他的“阶级力量平衡论”是整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秉持的社会主义框架。

▲：维克多·阿德勒在1889年建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之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便与社会民主党过从甚密，相当多的左翼知识分子不仅进行理论研究，而且试图将他们的思想成果映射进社会现实，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奥地利历史文化—知识分子—政治斗争三元结构的特点。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指出，思想文化传统是揭示20世纪奥地利在多门学科都做出傲人成就的原点。维特根斯坦有一句耳熟能详的格言：“一幅画把我们俘虏，我们却无法脱离它。”^①意思是，每个民族都有其传统典范，人民生活在独特的言语知识规范之中，这和德国思想家伽达默尔的理解是趋同的。我赞同这种观点，借用奥托·鲍威尔的文化解释观念，我认为每个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诸概念和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时候，都受到该文化体系中知识分子传统的强烈影响。

奥托·鲍威尔的话已经被广泛传播，“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黑格尔而来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唯物主义而来的，那么，年青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派’部分地来自康德，部分地来自马赫”^②。当然，边际效用学派和维也纳学派生成的新认识论和方法论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想要改变社会，其基础步骤是完成这种改变需要的科学基础。于是，他们的理论研究工作扎根于思想观念的冲撞之中。不过，我们要更加关注卡尔·伦纳的论断，“卡尔·马克思是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但是他的理论必须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实际层面，把他的思想功能运用到现今的社会，特别是具体到个人、国家、社会和人民，才能证明它的有效性”^③。面对各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涌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真正连结他们的是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感（政治目标）——建立社会化的民主国家。他们都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自觉，他们有义务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教育群众科学的批判方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社会转型的斗争做好心理和纲领的准备。

1919—1934年，奥地利左翼的国家精英（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者和社会民主目标的承袭者）以及基督教社会党的精英们都声称，奥地利下层阶级人民是他们的家人。尽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一定程度上和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政策有偏差，但这么做的基点是他们对历史决定论和进化论的理解，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制订“掩盖”了社会民主的性质，而是需要对当时奥地利的政治—社会情境加以具体分析。奥托·鲍威尔认为，社会民主使得工人们能够把自己的事务带进更高的决策水平，但是这些工人必须经过良好的教育，才能增进他们对民主常识的理解。不过实际情况是，在这期间（尤其是“红色维也纳”时期），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将教育工作作为一整套体系来提升对社会民主概念的理解，但这并没有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顺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高估了在资本主义内部推行个别社会主义政策的作用，实际上，在法西斯主义和其他任何反动势力的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lated by G. E. M. Anscomb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53, p. 115.

② [奥]奥托·鲍威尔著，殷叙彝编：《鲍威尔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7—328页。

③ Charles Gulick, *Austria from Habsburg to Hitler (Vol 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p. 1374.

高压之下，社会党模糊的斗争策略是无效的。

▲：我们很遗憾地看到 1934 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溃败，您和世界范围的众多学者都在严肃讨论这次失败的深层原因。显然，直到最后关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依旧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派别，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看作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也没有完全放弃暴力夺取政权的想法。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已然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积极代言人，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他们试图修正社会主义的理论，把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糅合在一起，企图通过拼接各自的进步因素到达所谓的中派思维，渐渐偏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

●：你说得很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武力”概念是解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覆灭之谜的关键。1919 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为了回应列宁的暴力革命论展开了一场辩论，围绕的中心议题便是统治中的“强制暴力”问题。麦克斯·阿德勒当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文是其马克思主义观的最好概述，是理解后期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必读文献。我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崩溃原因的理解分成几个层次，当然，正如你提到的，在国家控制中有节制地使用暴力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认为，对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溃败，我们还应从其他层次去理解，比如奥托·鲍威尔的心理能力不具备在受到现实武力威胁的情形下采取行动的能力。奥托·鲍威尔坚决把“防御性暴力”的观念写进社会民主党的施政手册——“林茨纲领”，也确实在实践中无法抵御多尔富斯的武装暴动。我认为，大多数国家的防御性暴力（人们可以辩称，至少在维也纳，防御性暴力是针对基督教社会党的威胁）是理解改良主义（也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核心。麦克斯·阿德勒以及其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左派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对待列宁主义的态度上出奇地一致，即认为列宁误解了马克思，是俄国的革命条件使得他做出了对马克思教义的修订。那些从俄国逃到维也纳的孟什维克也加固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对这个观点的认知。其实，我们可以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拆解为每个个体，他们都对团体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像我刚刚提到的，防御性暴力是他们的集体意识，排除了任何主动采取暴力手段的可能。

▲：直到 1934 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法西斯党的暴虐下解体，鲍威尔一直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家和战术家。奥托·鲍威尔中晚期的核心思想被称为“整体社会主义”。相比同时期的其他社会主义构想，奥托·鲍威尔提供了较为务实的努力方向，旨在与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第三国际联合对抗法西斯主义。

●：奥托·鲍威尔的“中间道路”和“整体社会主义”设想都是他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政治理由。19 世纪晚期，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折中主义的概念。1914 年左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权衡利弊之后接受了异己的资产阶级政党联盟赋予他们的政治合法性。他们也认为社会民主在现实政治中的表现是议会多数，但是他们要求资产阶级放宽阻碍工会化的法律。我认为，奥托·鲍威尔没有意识到 20 世纪初政治斗争的极端尖锐性，因此，他的折中主义与其说是妥协政治，不如说是宽容政治，奥托·鲍威尔用它来证明对待阶级敌人不该使用暴力形式，而应该强调阶级合作。当然，奥托·鲍威尔并不满足于阶级力量的平衡，他认为可以通过工人的教育来渐进地扩大无产阶级的优势——教育使更多的工人有意识地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在德国和奥地利，奥托·鲍威尔无疑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人物，他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绝对领袖，他的思想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中最辩证的。当采取战略立场或战术行动时，他全面展现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鲍威尔没有在哲学上更多地与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和麦克斯·阿德勒的认识论进行复杂性对话，也许有人因此称他为“辩证实用主义者”。正如前面谈到的，在 20 世纪 30 年代，奥托·鲍威尔创造了“第三条道路”或“整体社会主

义”的概念，试图将第三国际与非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家）统一起来。以当代欧陆学者的眼光审视奥托·鲍威尔，他的贡献在于给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提供了对立立场综合、多样模式统一的可能路径。对奥托·鲍威尔的研究兼及积极意义和消极因素，比如，正因为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战略失误，导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瓦解，这就提示从反面研判如何更有效地制订社会主义策略。这需要在“整体社会主义”观点的统摄下，但又要避免鲍威尔理论中的“幻想”因素，这些幻想恰恰破坏了他那个时代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社会计划。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解决本国民族问题时提出的一些设想和策略为推动民族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它们在当代有现实意义吗？

●：奥托·鲍威尔的文化差异理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向“团结”的社会共同体构想靠近，当然这与“整体社会主义”的协调并进思维紧密关联。当前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讨论并不过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奥托·鲍威尔早在一百年前提出的多元主义框架为解决当前欧洲、甚至更大范围的难民危机提供了关联性很强的理论支撑。短期内组建一个真正的欧洲共同体看来是不现实的，由于文化差异等因素的累积，在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和学者也极力反对当前的移民政策。尽管我本人坚定地认同欧盟的移民政策，但它需要更多的思考，因为深刻的文化差异使英国、斯洛伐克或匈牙利对那些寻求家园的贫困人口产生抵触。欧洲的发展现实也告诫我们，不能简单地在一个被认为是“国家联盟”的结构中强制要求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配额制度当然是一个开始，但在制度条款的背后，需要认真地对每个国家“文化融合”的棘手问题进行政治哲学的论证。遗憾的是，奥托·鲍威尔并没有在实际研究中运用他对民族文化差异的理解。但是，他的概念推演和政策拟定可以为欧盟决策者提供一个基础，让他们思考新移民如何融入本国的多元文化背景。我认为，欧盟管理者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它不仅应得到欧盟各国现行人权法律的支持，而且亟待果断诉诸欧盟法庭，这样才可能营造多民族复杂的合作方式所必须的对话空间，使欧盟能够更灵活地与移民代表进行对话。

麦克斯·阿德勒理解的民主是每个人的实际个性，因为个性是由他（她）自己所处的共同体文化规约的。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与移民代表的对话机制错综复杂，一方面要保全移民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为自己说话的基础，另一方面要让每个欧盟国家能在文化上保持稳定性和延续性。这就要求产生一个能够支持这种多样性、普遍人权准则和机动灵活的“团结”的欧盟。目前，欧盟地区经济协会是理解这种文化认同的基础，它主张跨越国界，在实现欧盟更广泛的人权目标方面进行合作。我们需要发明一系列新的语汇从而既保持文化认同的传统，也容纳动态的民族特定权利的新意涵。然而，传统也必须是灵活的和开放的，以实现欧盟民主、人道和团结的目标。一些文化分析人士称欧盟是一种“联合”，而不是一个“联盟”。这是因为，在文化发展的广泛目标上，各成员国具有充分的共识，通过强调更广泛的协议可以更容易地解决民族—国家之间的分歧。如果我是欧盟的决策者，我会积极支持跨国界的“区域”移民政策，促进地方管理者加入到对话中来，就像这些地区性的联系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农业）上的相互依赖一样。

（访谈者系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

（编辑：张 剑）